

索伦与达斡尔西迁新疆述论

吴元丰

清乾隆年间，清廷从黑龙江布特哈索伦（即今鄂温克族）和达斡尔兵丁内挑选年轻力壮者千余名，携眷移驻伊犁，组建了伊犁索伦营。从此，这部分索伦、达斡尔及其后代扎根在我国西北边陲，为保卫和建设边疆做出了应有的贡献。研究索伦和达斡尔西迁新疆的历史，对民族史和边疆史都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一、索伦与达斡尔西迁的历史背景

18世纪中叶，清朝正处在“康乾盛世”的鼎盛时期，完成了新疆天山南北的统一事业。为了巩固统一局面和加强西北边防，清廷决定选派官兵到天山南北各重镇要地驻防屯田。伊犁“地处极边，形胜四塞”，^①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。乾隆二十四年（1759年），清廷统一新疆天山南北后，立即选派官兵到伊犁驻防屯田，修筑城池。当时派驻“伊犁马兵一千五百名、绿营兵二千名，”^② 其中马兵负责驻防，绿营兵则负责屯田和筑城。后考虑到“伊犁系初始驻兵之地，所有驻守地方、巡查边界及承应官差等事务均需马兵，应较其他地方多设兵丁，以壮声势。故此，除伊犁现有马兵一千五百名外，再增加马兵一千名，共设二千五百名马兵。”^③ 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，创设伊犁将军，驻伊犁惠远城，总理天山南北军政事务。从而伊犁不仅成为西北边陲的

①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卷4，第1页。

②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 860—1。

③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 860—1。

军事重镇，而且成为新疆政治中心。随着伊犁军事和政治地位的提高，也需要增加驻防屯田官兵。当时派驻伊犁的官兵，均非永久性驻防屯田者，按规定每三年换班一次，他们都从内地各省抽调派驻，既耗费时间，又糜费钱粮，决非长久之计。早在乾隆二十六年（1761年）准备派遣伊犁等处换防官兵时，军机大臣傅恒就提出了解决非永久性驻兵的建议。

傅恒奏称：“倘若察哈尔八旗单身贫困余丁内，拣选年富力强、情愿携眷迁移之人，食钱粮者准食原钱粮，无钱粮者赏粮食钱，令其迁往伊犁、乌鲁木齐永久驻防，则嗣后既无换班之烦，且无钱粮者得食钱粮，于其生计亦有裨益。请飭交八旗总管等，从察哈尔兼管新旧厄鲁特及察哈尔八旗单身贫困余丁内，拣选年富力强、情愿携眷迁移者一千名，分别迁往伊犁、乌鲁木齐永久驻防。”^①乾隆帝采纳了傅恒的建议，从张家口外察哈尔八旗内拣选年富力强者千余名，携眷移驻伊犁等地。他们是首次携眷迁往新疆永久驻防的八旗官兵。这些察哈尔官兵的携眷移驻，只是解决了部分伊犁驻防官兵的非永久性问题，仍有大部分官兵从内地各省抽调派遣，定期换防。

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十二月，清廷为了彻底解决新疆伊犁等处驻防官兵的非永久性问题，对全国驻防八旗兵开始调整，抽调一部分满洲八旗官兵携眷移驻，同时也将有些地区驻防汉军旗官兵裁撤，并入绿营缺额，其空出之八旗兵缺，拨给索伦、察哈尔人等，而后携眷移驻新疆伊犁。为此，乾隆帝特颁谕旨曰：“先前派满洲兵驻防凉州、庄浪地方，尚在乎定准噶尔之前，因彼处为西陲要冲，故从西安满洲、蒙古、汉军兵内，抽调马步兵四、五千名，设置将军、副部统及协领、佐领等员管带，分驻凉州、庄浪二处。今准噶尔、回子诸地均已平定，巴里坤以西皆为内地，不可仍以凉州、庄浪为边徼，而该处并无行围习艺

①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 860—1。

之所，以致兵丁怠惰偷安，俱归无用。何必以众多满洲兵闲驻无用之地。现在伊犁建设城堡，开垦屯田，设置将军总统管理，与其三年一次遣派换防兵更番戍守，不如将凉州、庄浪兵丁就近携眷移驻伊犁为好。至京口、杭州等处，亦不必多驻兵丁。先前曾有汉军人等皆准出旗充作练营兵，裁其所出之缺，此份额拨给索伦、察哈尔人等，拣选其丁，派往伊犁驻防，于地方有利，且伊等得以操演技艺，可为国家之劲旅。著军机大臣等，将凉州、庄浪满洲兵丁作何携眷移驻伊犁，京口、杭州等地汉军人等作何调补绿营兵，其缺拣选索伦、察哈尔丁派往伊犁之处，详密定义具奏。”^① 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正月初六日，军机大臣傅恒遵旨议奏：“查得，现驻凉州、庄浪满洲、蒙古兵并无用处，久闲安逸，必致庸懦，应遵圣训将伊等皆携眷移驻伊犁，以杭州、京口汉军调补绿营兵，其份额拣选索伦、察哈尔兵丁移驻伊犁，便省新疆换防之烦，伊等亦可操演技艺，实属大有裨益之事。臣等酌情议得，现往伊犁已派八百户察哈尔兵，若再派四五千名满洲、蒙古、索伦、察哈尔驻防，则无需换防兵丁，即可防守地方。是故，将凉州、庄浪三千二百名满洲、蒙古兵，应遵旨尽数携眷迁往伊犁永久驻防。……京口驻防汉军三千三百余名，虽系水师营缺，不可裁撤，然今太平无事，无需众兵驻守，而去岁皇上南巡时，检阅其操演，技艺甚劣，徒有虚名，并无实效。江南现有驻防满洲、蒙古兵近六千名，数额极多，若从中拣选熟谙水师营事宜者千余名驻守京口，将京口汉军兵缺概行裁汰。其缺给与索伦、察哈尔兵丁，派驻伊犁，则于海疆、新疆地方均得劲旅，而索伦、察哈尔等获食钱粮，于其生计亦大有裨益。请飭令该将军、总督等，将酌选江宁兵丁驻守京口、京口汉军作何拨归绿营之处，惟从速定义，空出其缺，一面奏闻，一面即行办理。其缺额理应选取索伦、察哈尔丁，故飭令黑龙江将军、察哈尔都

①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 860—1。

统等，从索伦、察哈尔丁内，选其情愿携眷迁往伊犁者，索伦一千名、察哈尔一千名，均作为披甲，照先前移驻察哈尔、厄鲁特之例，将内地应得钱粮及出差应得盐菜银均支給，连同凉州、庄浪三千二百名满洲、蒙古兵，共计兵丁五千二百名，俱携眷移驻伊犁。”^① 这样，清廷就决定拣选索伦等人作为披甲携眷移驻伊犁。

清廷特选索伦携眷移驻伊犁，自有其一定的原因。索伦作为渔猎民族，善于骑射，骁勇强悍，是八旗军中的劲旅之一。早在乾隆二十二年（1757年）平定天山以北准噶尔部之初，有人提议选派索伦兵丁驻守伊犁时，乾隆帝未采纳，并降旨阐明其理由曰：“至所以索伦兵丁前往新疆管理厄鲁特事宜，毋论远道迁移，事属不便，且索伦系属骁勇，若与厄鲁特聚处，势必染其余习，将来渐不可用，甚属无益。”^② 时至乾隆二十七年（1762年），伊犁地方的形势已发生变化，设置将军总理天山南北军政事务，除屯田的绿营兵和维吾尔族人外，已派驻一定数量的八旗满洲、蒙古换防官兵，也派驻了一部分携眷察哈尔蒙古兵，民族构成多元化，外来人口逐渐超过存留的厄鲁特人口数目，已消失了“染其余习”之患。另外，伊犁地方辽阔，水草丰美，宜农宜牧，并有较好的狩猎场所。将“素属骁勇”的索伦、达斡尔人披甲携眷移驻伊犁后，不仅有利于加强边防，而且便于其生计和行围操演，能够保持其战斗力。在索伦、达斡尔兵丁移驻伊犁27年后，即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伊犁将军保宁奏称：“索伦等原本技艺高超，自移驻伊犁以来，每年换防各地、巡查边界、驻守卡伦、行围狩猎等野外官差甚多，本地生长之年轻人，并不亚于陈索伦人等，皆勤学技艺，奋勉当差。”^③

① 军机处满文议复档 860—1。

② 《清高宗实录》卷 530，第 17 页。

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3337—015。

三、索伦与达斡尔西迁的经过

清初，在嫩江流域居住的索伦、达斡尔人被编入八旗，分设牛录，承应各种官差。其中挑选一部分壮丁为披甲，携眷分迁到爱辉、墨尔根和齐齐哈尔等城驻防，分别归黑龙江、墨尔根、齐齐哈尔三个副都统管辖。留居嫩江流域的索伦、达斡尔人，除有一部分壮丁披甲当差外，其余人承担贡貂差使，所以称之为布特哈索伦、布特哈达斡尔。在清朝档案文献中，有时将布特哈索伦、达斡尔等人统称为布特哈索伦。“布特哈”系满语，意为“打牲”。康熙年间，在嫩江西岸伊倭齐地方（即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）特设总管衙门，管理布特哈索伦、达斡尔等人事务。该总管全称为管理布特哈索伦、达斡尔总管，简称布特哈总管，归黑龙江将军管辖。

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正月二十三日，黑龙江将军国多欢接到挑选布特哈索伦、达斡尔兵丁携眷移驻伊犁的上谕和军机处咨文后，就开始办理有关事务。首先，为了鼓励自愿报名移驻伊犁，防止拒绝移驻事件的发生，召集布特哈总管管辖下的所有92牛录索伦、达斡尔和鄂伦春人众，按军机处咨文之意，晓谕有关事宜，特别是对生活待遇的改善和提高方面作了一定的承诺。当众宣布曰：“现将尔等移驻伊犁，特系圣主施恩，使尔等生计宽裕起见。如今虽赏尔索伦等二千份钱粮，然皆为半个钱粮。现若移驻伊犁，则可获全额钱粮、盐菜银，又赏给立业牲畜及整装等项。”^①接着，从布特哈索伦、达斡尔内各选500名兵丁，共计1000名。为了这1000名兵丁顺利携眷移驻伊犁，“每百人内，拣选二人为头目，令其管理。”^②同时，选派布特哈总管1员、副总管1员、佐领10员、骁骑校10员管带护送。

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 1763—1。

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 1763—1。

在起程前，黑龙江将军又按照军机处议奏准行的办法，给所选拟迁兵丁及管带护送官员均发放整装等项银两，以便置办迁移途次应需牲畜和物品。“管带携眷移驻伊犁一千名索伦兵（其中包括500名达斡尔兵）迁往之总管一员、以副总管作为委营总一员、佐领十员、骁骑校十员，应支給伊等之整装等项银两、口粮，遵照军机处议奏之例，统共二十二名官员，按其各自职衔，支給一年俸禄，共计一千八百八十五两；一千户兵丁，按每户各赏银三十两计，共支給银三万两；因兵丁不携带跟役，按每人各赏置办兵器银十两计，共支給银一万两；总管、以副总管作为委营总每人各给马十匹，佐领每人各给马十匹，骁骑校每人各给马六匹，一千户兵丁大小人口共二千八百三十八名，每口各给马一匹，共二千九百九十八匹，按每马折给价银八两计，共支給银二万三千九百八十四两；一千户兵丁，每户各给驼一只，共给驼一千只，按每驼折给价银十八两计，共支給银一万八千两；每户各给帐房一顶、锅一口，共计应给帐房一千顶、锅一千口，按每帐房价银四两、每口锅价银二两计，共支給银六千两；总管、以副总管作为委营总每月各支給盐菜银六两、各拨给跟役六名，佐领每月各支給盐菜银四两、各拨给跟役四名，骁骑校每月各支給盐菜银二两、各拨给跟役二名，兵丁每月各支給盐菜银一两五钱，官员之跟役每月每名各支給盐菜银五钱，共支給盐菜银三千二百十六两；官员之跟役七十二名，按每名各赏银二两计，共支給银一百四十四两。以上共支給官员、兵丁、跟役银九万三千二百二十九两。一千户兵丁之大口二千四百零五名、小口四百三十三名，连同管带前往之官员及其跟役七十二名，共计大小人口二千四百九十九名。按大口每月各支二石四升九合、小口减半支給计，应支两月口粮共一千三百五十二石三斗一升九合。所有应支银两、口粮，均由库存备用银两、仓存粮石内支拨。”^①

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49—002。

至于索伦、达斡尔官兵的起程迁移事宜，因伊犁地区急需驻防官兵，同时也需要预先备办安置事宜，经军机大臣奏定，分两批迁移，第一批官兵不携带家眷先期起程，要求当年抵达伊犁，第二批官兵携带所有家眷随后起程，要求次年抵达伊犁。然而，在办理起程事宜的过程中，黑龙江将军国多欢发现，若第一批官兵不携眷迁往，则有诸多不便。遂具折奏称：“惟索伦等有跟役者少，在平常游牧时，其妻孥等趋赶驮载蒙古包及拉车之牲畜。今选派首批起程之五百名索伦等，俟本年返青后，若携带家眷迁往，不仅不分散力量，且对兵丁有益。第二批起程之五百名索伦等，俟青草长出后，养肥牲畜，于四月底或五月初起程，”^①黑龙江将军国多欢的这一建议，经军机大臣议奏，奉旨准行。另外，在备马发给拟迁伊犁的索伦、达斡尔官兵和家眷时，布特哈地方民间拥有的马匹有限，需要动用一部分官牧厂马匹，或搭给一部分牛只使用。因此，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二月十三日，布特哈总管噶布舒等呈文黑龙江将军衙门曰：“由布特哈地方移驻伊犁之兵一千名，按其人口计算，共需给马四千匹。布特哈官兵、闲散、西丹等所有四岁以上驢马、儿马、生骡马，均置买得给，虽可足数，但此次移驻兵丁之家眷无法乘骑或驮物，不甚得力。先期起程之五百名索伦官兵，尽量得给堪以乘骑及驮物之马后，令其起程外，后期起程之五百名达斡尔官兵，若搭给剩余生骡马，则达斡尔妇女原本不会使用马匹，以致不甚得力。……现从本处官牧群内，挑取堪以乘骑之驢马、儿马、骡马拨给，每匹马价银八两。若仍不敷，则酌拨被选兵丁之自身牛只及留家人丁之马匹得给，便于其妇女等趋驾车辆，且在家留下之布特哈官兵也存有少许马匹，于其捕貂当差皆有裨益。”^②黑龙江将军国多欢采纳布特哈总管噶布舒的建议，妥善解决了索伦、达斡尔官兵

①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 1763—1。

② 黑龙江将军衙门满文档案 1763—4。

及家眷迁移所需牲畜的问题。

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四月初十日，俟开春返青后，被编为第一队的500名索伦兵，在选派护送的总管努门车及佐领、骁骑校等11名官员的率领下，携带其家眷1421口，从东北嫩江流域起程，开始西迁新疆。经过漠北蒙古车臣汗部、土谢图汗部地方，于八月中旬，抵达赛音诺颜部乌里雅苏台地方。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照军机处议奏之例拨给六个月食粮、茶叶、盐菜银，并换下其疲瘦之马270匹，由当地官牧厂选马换给。同时，在管带护送总管努门车等官员呈文请求下，由当地官牧厂共拨驼250只，每两户各借给1只，以供乘骑和驮载物品，并规定抵达伊犁后归还当地官牧厂。^①八月底，从乌里雅苏台起程，继续西行。经过扎萨克图汗部和科布多地方后，发现所带食粮抵达伊犁之前不敷用，故总管努门车呈文伊犁将军曰：“索伦地方本无骆驼，只靠马牛驾车，于青草长出前，四月初十日，即行起程，马牛尚未长膘，途次有疲惫丢弃者，其所剩马匹内，至乌里雅苏台后，由彼处将军、参赞大臣仅换给二百匹。此外，因乌里雅苏台迤西车辆无法行进，努门车我又呈请将军、大臣等，以我之名具奏，每两户合给驼一只计，共借给二百五十只。于是，由乌里雅苏台领取至十二月初十日前之三个月米石、三个月茶叶，共六个月行粮，而后起程。唯五百名官兵之家眷众多，每两户合给驼一只，驮载许多行粮，负重行进，且所有妇女老少大半徒步行走，竟不能速行，每日只走二十、三十里。故视众人之力，牧放牲畜徐徐行走，越过察干鄂博，沿额敏河而上，于来年正月内，方可抵达伊犁。因而原携带行粮少许不敷，请将军、参赞大臣置办少许行粮，迎送接济。”^②伊犁将军明瑞接到此呈文后，于十二月初一日，委派官兵携带米面，直赴额敏河地方接济。同时，又委

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45—005。

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49—016。

派官兵携带米面，前往博罗塔拉地方，以备接济。经伊犁将军明瑞委派官兵前去接济，于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正月十九日，第一队索伦携眷兵丁顺利抵达伊犁。^①

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年）五月初三日，即第一队索伦兵丁起程后的24天，被编为第二队的500名达斡尔兵丁，在选派护送的副总管色尔默勒图及佐领、骁骑校等11名官员的率领下，携其家眷1417名，从东北嫩江流域起程，开始西迁新疆。经过漠北蒙古车臣汗部、土谢图汗部地方，于九月下旬，抵达赛音诺颜部乌里雅苏台，并选其附近扎巴坎地方扎营过冬。至第二年开春后，副总管色尔默勒图呈文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曰：“虽本队兵丁在此过冬休整，但原先所带牲畜疲瘦，且牛车皆途次毁坏。现为便于供给其行粮起见、请经巴里坤、乌鲁木齐前往。唯前往时，兵丁妻室子女乘骑之马匹，若驮载行李食粮行进，则戈壁大，兵丁之妻室子女内现正出痘者尚多，一同徒步行走，难免无益处。请将军、大臣等给兵丁格外施恩，除多支给钱粮外，照第一队兵丁所请之例，拨给驮载物品之驼，使其得利。俟抵达伊犁后，将此驼只交给彼处将军、大臣等，照数拨归官牧厂。”^②于是，乌里雅苏台将军成衮扎布按其所请，每两户合给驼一只计，共借给驼250只，每人各支给两个月钱粮。于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三月中旬，从乌里雅苏台起程，取道巴里坤、乌鲁木齐前往伊犁。四月二十六日，抵达巴里坤，休整15天后，领取两个月盐菜银、口粮，于五月十一日，起程西行。^③六月十九日，抵达乌鲁木齐，领取40天盐菜银、口粮、两个月饷银后，于六月二十三日，起程继续西进。^④七月二十六日，第二队500

①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142—2。

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78—001。

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87—010。

④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95—016。

名达斡尔携眷兵丁也顺利抵达伊犁。^①至此，所有 1000 名索伦和达斡尔携眷兵丁全部到达新疆伊犁。

三、伊犁索伦营的组建及其沿革

在索伦、达斡尔兵丁移驻伊犁之前，于伊犁河北岸已开始修筑将军驻城，并派驻八旗满洲和绿营换防兵，移驻一部分携眷察哈尔蒙古兵，收编留居伊犁的厄鲁特蒙古披甲当差。当决定移驻索伦、达斡尔携眷兵后，伊犁将军明瑞考虑到当地的驻防布局和携眷兵丁的生计，重新划定厄鲁特、察哈尔、索伦、达斡尔等携眷兵丁的驻牧和种田地方。乾隆二十八年（1763 年）八月十五日，将军明瑞奏称：“伊犁驻牧之厄鲁特及携眷索伦、察哈尔逐渐增多，其每年种田、夏牧及过冬之地，皆应指定，按季游牧，方与四项牲畜有益。查得，博罗塔拉系厄鲁特地域内有名之地，种田过冬皆宜，且在附近山里亦可夏季放牧。唯于塔尔巴哈台驻兵前，暂不必驻牧。此外，若驻在远处山里，不仅难以管束，而且往返当差极为劳顿。故经奴才等共同商定，察哈尔兵夏季驻牧于阿勒班西伯里哈善地方，种田在托霍斯塔里，过冬在沙喇博霍沁。其地辽阔，续迁之察哈尔兵也合驻。厄鲁特夏季驻牧于霍诺霍依、科多尔海等处地方，种田在空济斯察肯、果尔班济尔噶朗，过冬在空济斯、阿布喇勒。在此等地方驻牧后，通往特穆尔图诺尔大小道路之卡伦，理合密集设置，届时奴才等自沙图阿曼、特克斯等驿站延伸所设卡伦外，酌选地方设置卡伦。索伦（包括达斡尔）驻于奴才等驻地（即指惠远城）附近有利，相应令其夏季驻牧于赛里木诺尔，种田在察罕乌苏，过冬在霍尔果斯。如此则索伦、察哈尔、厄鲁特等种田放牧时，各得肥沃土地和丰美草场，有利于生计，且地方辽阔，将无相互争夺牧场之

^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106—021。

事，甚有裨益。”^① 所以，第一队索伦兵丁抵达后，就安置在霍尔果斯河迤西沙玛尔、齐齐哈尔、土尔根、撒橘等地；第二队达斡尔兵丁抵达后，就安置在霍尔果斯河迤东克阿里木图、霍尔果斯、富斯克等地。

同时，将 1000 名携眷索伦、达斡尔兵丁编设了 6 个牛录，其中索伦 3 个牛录、达斡尔 3 个牛录，分为左右两翼，统称索伦营。该营设领队大臣、总管、副总管各 1 员，佐领、骁骑校各 6 员，负责管理营务。

至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 年），由于伊犁索伦、锡伯、察哈尔等营生齿日繁，官差增多，原有官员业已不敷管束。于是，伊犁将军阿桂奏称：“移驻伊犁之索伦、锡伯、察哈尔兵，按厄鲁特例，编设牛录，故不论旗分，曾以二百户为一牛录，每爱曼（即营）各设六牛录。今生齿日繁，一切差使等项烦冗，如仍旧责成六牛录官员管理，实属不足。再两翼厄鲁特中，右翼人众，且陆续来归之厄鲁特较前又多，只责成六牛录官员管束，亦显不足。明瑞陛见时，曾奏厄鲁特足够编两牛录，奉旨准行。除照办外，其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等三爱曼，亦请仿照厄鲁特爱曼，增设两牛录，俱为八牛录，以为八旗。”“又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、厄鲁特牛录，即已各为八旗，其旗纛颜色，应按旗授之。”“原有左右翼（厄鲁特）总管关防，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总管关防及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、厄鲁特佐领图记所铸字样均已不合，应照现在整饬之例，重新改铸颁发，以标旗色。”^② 奉旨准行。此次索伦营的整编未增加兵数，将原有的 1000 名兵，分编八旗，每旗各设 1 牛录，除原有佐领 6 员、骁骑校 6 员外，增设佐领 2 员、骁骑校 2 员，并从披甲内选取领催 8 名，连同原有领催 24 名，共计 32 名，每牛录各为领催 4 名、披甲 121 名。在此基础上，颁发了新

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49—013。

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232—043。

的总管关防和佐领图记，以及镶黄、正黄、正白、正红、镶白、镶红、正蓝、镶蓝八种颜色式样的旗。不久，因管理卡伦事务的需要，“于伊犁索伦、达斡尔内，视其效力奋勉、知晓卡伦事宜者，陆续拣选九名，给戴六品空蓝翎，轮驻卡伦。”^①至此，伊犁索伦营的建制基本确立。

而后，伊犁索伦营的建制也有变化。乾隆五十六年（1791年），乾隆帝特颁谕曰：“伊犁索伦、达斡尔营兵丁移驻以来，一切差使均极奋勉，且于喀什噶尔、塔尔巴哈台换防差务，皆甚得力。唯近几年生齿日繁，每月所食一两饷银，难免不敷供养。著加恩伊犁索伦、达斡尔兵丁，每月各赏食二两饷银，并添设养育兵三百名，每月给食饷银一两，以示朕垂爱旗奴之意”。^②后经将军保宁奏请变通办理，索伦营领催、披甲每月原食饷银1两外，各增加饷银1两，共计2两；拨给300份养育兵钱粮，添设养育兵200名，每月给食饷银1两；其余100名养育兵之额，添设前锋40名，其中4名为前锋校，每月给食饷银2两5钱。^③乾隆五十七年（1792年），又经将军保宁奏准，每旗各设委官2员、空金顶8名。道光八年（1828年）平定张格尔之乱后，办理善后事宜，为了进一步加强新疆地区的防务力量，经钦差大臣那彦成建议，由军机大臣长龄奏准，索伦营增添披甲100名，并于左右两翼各设防御1员，专管前锋。^④这样，伊犁索伦营的建制进一步完善和最终确立。索伦营下设八旗，每旗各设1牛录，设有领队大臣1员、总管1员、副总管1员、佐领8员、防御2员、骁骑校8员、委官8员、空金顶8员、空蓝翎9员、委笔帖式2员、前锋校4员、前锋36名、领催32名、披甲1038名。

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481—030。

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3337—015。

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3337—015。

④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5227—3。

嘉庆二年（1797年），索伦营出现了严重的兵源危机，无法补充兵缺。为了解决兵源危机，伊犁将军保宁奏称：“伊犁索伦营人口增长向来不佳，竟有绝嗣之户，以往挑选披甲，已难得强壮闲散之丁。不料去年传染出痘，该营闲散丁亏损约四百名，现余闲散丁无多，亦俱年幼。是故，今挑选披甲，竟不得年力精壮者。伏思，索伦营兵系一支劲旅，若不稍加调整办理，而以幼丁为兵充数，或致兵数减少，均不成事体。奴才留心细查，近数年来，锡伯营人口甚旺，现堪以披甲之闲散丁颇多。索伦、锡伯俱系东三省之人，风气相近，若锡伯营闲散丁移补索伦营，现即可得强壮之兵，而自幼与索伦合居一处，日久练习，自然俱成壮健之兵。”^① 遂奉旨准行，“于锡伯营十八岁以上、三十五岁以下强壮闲散丁内，选出即可挑甲者一百六十户，移至索伦营，按各该牛录闲散丁之多寡，分补挑甲。”^② 然而，道光十三年（1833年），由于战争伤亡，索伦营再度现了兵源危机。索伦营领队大臣奇成额呈文将军特依顺保曰：索伦“营人口增长向来较差，道光六年、十年，喀什噶尔出征官兵内阵亡者二百三十余名，其所遗之缺，皆选身材较高之闲散，补充兵缺当差。现有闲散丁，皆年幼尚未长成。故八旗披甲缺，委实不能选补，可否仍照前例，由锡伯营再拣选闲散丁一百名，连同家眷一并移入索伦营，以备拣选拔甲。”^③ 经将军特依顺保转奏，“照前办之例，由锡伯营拣选闲散丁一百名，连同家眷一并移入索伦营，均匀分至各该牛录。”^④ 先后两次共选锡伯闲散丁260户移入索伦营，使其兵源危机得到了彻底解决，同时伊犁索伦营兵丁的构成更加多元化，包括索伦、达斡尔和锡伯三种民族的人。

① 宫中满文朱批奏折朝年包第745号。

② 宫中满文朱批奏折朝年包第745号。

③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545—2。

④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545—2。

同治年间，伊犁地区发生战乱。不久，沙皇俄国乘机入侵伊犁，割占了霍尔果斯河迤西索伦营兵丁驻牧的地区。索伦营兵丁无法忍受沙皇俄国人的凌辱，携其家眷纷纷逃难到塔尔巴哈台。光绪八年（1882年）收复伊犁后，在塔尔巴哈台的索伦营兵丁有部分回到伊犁，并编入刚刚恢复的索伦营，留在塔尔巴哈台的索伦营兵丁，则编入了当地的新满营。1911年辛亥革命后，清朝虽已灭亡，但伊犁索伦营制仍保留过一段时间，而后才被废除。今新疆伊犁霍城县和塔城地区的鄂温克族、达斡尔族、锡伯族就是清代伊犁索伦营兵丁的后裔。

四、伊犁索伦营承担的主要任务

索伦营与满洲、锡伯、察哈尔、厄鲁特4营共同组成伊犁驻防八旗军，它是一个军政合一的组织，具有军事、行政和生产三项职能，除临时性的特殊任务外，平常承担的主要任务有以下几项。

1. 驻守卡伦。在清代，“新疆南北各城皆设卡伦，而伊犁为最多。伊犁境内，东北则有察哈尔，西北则有索伦，西南则有锡伯，自西南至东南则有厄鲁特，四营环处（中间有惠远、惠宁二城，伊犁将军、各营领队大臣和满洲营驻守），各有分地，其禁在于私越；又有铜厂、铅厂、屯工、船工、安置发遣罪人，其禁在于逋逃；至于境外，自北而西则有哈萨克，自西而南有布鲁特，壤界毗连，其禁在于盗窃，故设卡置官，派兵巡守。两卡递筹巡查之路名曰开齐，小卡伦分置了望之处曰布克申，而统名之，则曰卡伦。”“各卡伦安设，有常设、移设、添撤之分，历年不移而设有定地者，是谓常设之卡伦”；“住卡官兵有时在此处安设，有时移向彼处，或春秋两季递移，或春冬两季递移，或春夏秋冬三季递移者，是谓移设之卡伦”；“其地虽有卡伦，而有时安

设，过时则撤者，是谓添撤之卡伦”。^① 索伦营驻守的卡伦都在惠远城西北一带地方，共有 10 处，其中霍尔果斯、齐齐哈尔、奎屯、博罗呼济尔、崆郭罗鄂伦、辉发 6 座为常设卡伦，旧霍尔果斯安达拉、齐齐哈尔安达拉、河岸、奎屯色沁 4 座卡伦为添撤卡伦，而没有移设卡伦。以上 10 座卡伦，每年共派 212 名索伦营官兵驻守，每卡各驻 16 至 32 名不等。^②

2. 巡查布鲁特和哈萨克游牧地界。布鲁特游牧在伊犁西南，哈萨克游牧在伊犁西北和东北，此两处游牧地界均未派兵常年驻守，而由伊犁定期派兵巡查。这种巡查，属例行公事，其目的是防范偷盗，查禁擅自越界放牧或开垦种田，向哈萨克征收租马。布鲁特游牧地界每两年巡查一次，而哈萨克游牧地界每年巡查一次。每次巡查时，由伊犁将军选派领队大臣 1 员，率领各营官兵 300 名，其中索伦营官兵 50 余名。每次出行，往返约需一至两个月。

3. 塔尔巴哈台换防。塔尔巴哈台地处新疆天山北部，西南与伊犁接壤，是通达阿尔泰、科布多等地的要冲，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。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 年），在塔尔巴哈台地方修城，设参赞大臣 1 员，选派京城和黑龙江的八旗官兵驻守。自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 年）始，改由伊犁满洲、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、厄鲁特 5 营选派 1300 名兵换防，其中“满洲兵五百五十名、锡伯兵一百五十名、索伦兵一百名、察哈尔兵二百名、厄鲁特兵三百名，”^③ 并酌派官员管带。在这些换防官兵内，“满洲、锡伯官兵皆驻二年，每年按新旧之班，于青草长出时更换一半；索伦、察哈尔、厄鲁特官兵俱牧放孳生牲畜，且自力务农为生，故期满一

①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卷 11，第 1、11 页。

②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卷 11，第 1、11 页。

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230—041。

年即行更换。”^① 嘉庆十二年（1807年），增加赴塔尔巴哈台换防兵 100 名，其中索伦营兵 30 名。^② 至此，在塔尔巴哈台换防的索伦营骁骑校 1 员、兵 130 名。这一定额并非一成不变，因驻防需要有所增减，但变化不大。由伊犁派往塔尔巴哈台换防的官兵，除驻守城池外，还分驻塔尔巴哈台一带所设的 29 座卡伦。

4. 喀什噶尔换防。喀什噶尔是新疆天山南部重镇，是中西交通要道，地理位置十分重要。乾隆二十五年（1760年），设置参赞大臣 1 员，总理天山南部军政事务，并派西安、京城八旗官兵驻守。自乾隆三十六年（1771年）始，改由伊犁满洲、锡伯、索伦、察哈尔 4 营选派官兵换防。这些换防官兵，两年一换，每年换一半。其换防官兵的数额，随着天山南部地区形势的变化，不时发生变化。由伊犁改派换防官兵后，曾有一段时间，停止选派索伦和察哈尔营官兵，只选派满洲和锡伯营官兵。至嘉庆年间，又开始选派索伦营官兵换防。这时，由伊犁派出的换防官兵内，“索伦营佐领一员、骁骑校一员、领催四员、兵九十六名。”^③ 从伊犁派出的换防官兵，除驻守喀什噶尔城外，还分驻 18 座卡伦。

5. 开垦种田。索伦营官兵“除照例支給饷银外，所有口粮俱系自耕自食。”^④ 所以，索伦营官兵驻守卡伦、赴塔尔巴哈台和喀什噶尔换防、牧放官牧厂牲畜外，还开垦种田。乾隆二十九年（1764年）初，伊犁将军明瑞奏称：“查得，索伦等移驻伊犁，其生计多半依靠种田及狩猎。令伊等抵达时，正值种田之际，令其妥善垦种，可及早得利，以便供给。故奴才等留有其承应官差、出行狩猎、牧放孳生官蓄之时间，并计其耕作能力及足

① 军机处满文月折档 155—1。

②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卷 5，第 29、31 页。

③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卷 5，第 29、31 页。

④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卷 8，第 3 页。

够食用，每户各拨给耕地八亩。又按其食用之喜好，由仓存粮石内，动支小麦五十石、青稞五十石、黍子一百五十石，作为籽种，按原先所奏赏给。”^① 这就是说，第一队 500 名携眷索伦兵抵达伊犁的第一年，就开始开垦种田。第二队 500 名携眷达斡尔兵于农历七月底到达伊犁，已过播种季节，从第二年起，照第一队索伦兵之例开垦种田。按每户耕种 8 亩计，索伦营兵丁一年共种 8000 亩地。“索伦营八旗八佐领分左右翼，左翼屯田引西阿里玛图河水灌溉，右翼屯田引图尔根河水灌溉。”^② 其耕种所获粮石，毫不交公，均归耕种者自己食用。

6. 牧放孳生牲畜。清廷为了解决驻防官兵乘骑、食用和屯田所需的牲畜，在伊犁设置了孳生牧厂，分交察哈尔、厄鲁特、索伦、锡伯等营官兵牧放。索伦营的 500 名索伦兵牧放的孳生马 1000 匹、牛 274 只、羊 12975 只，500 名达斡尔兵牧放的孳生牛 276 只、羊 13025 只。^③ 这些孳生牲畜的数目，只是迁来之初发给的数目，根据档案记载来看，历年都有一些变化，并无常数。孳生马“按立马年限先后，分为三限取孳，谓之三年一均齐，每三年本马三匹取孳一匹。”^④ 孳生牛“按立牛年限先后，分为四限取孳，谓之四年一均齐，每四年本牛十只取孳八只。”^⑤ 孳生羊“按立羊年限，定为一限取孳，谓之一年一均齐，每一年本羊十只取孳三只。”^⑥ 至乾隆三十一年（1766 年）三月，伊犁将军明瑞查看发现，“索伦等经常游牧，接近蒙古之生活习惯，仍可放牧。达斡尔等原先务农屯居，尚会牧放马牛，竟不会牧放羊只

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49—002。

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049—002。

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181—054。

④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卷 10，第 3、4、5 页。

⑤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卷 10，第 3、4、5 页。

⑥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卷 10，第 3、4、5 页。

孳生，”^①致使所牧孳生羊倒毙。故经奏准，将其所剩 7232 只羊皆交索伦兵牧放。仅仅过了一年多，即乾隆三十二年（1767 年）六月，新任伊犁将军阿桂又发现，索伦等“耕种私田，牧放孳生及私有牲畜，官差不少，其驻牧之地，又系贸易哈萨克来往大道所在，较其他营多需看护之人，且索伦等在原籍时，养羊者少，不甚会牧放孳生。”^②遂经奏请，将其牧放的 10632 只羊都移交厄鲁特营牧放。乾隆三十八年（1773 年）闰三月，索伦营领队大臣都尔嘉呈文将军曰：索伦、达斡尔等“沿车济、齐齐哈尔、萨玛勒、奎屯等河而居，当种地时，放牧于河上游种地处所，俟入冬后，为避雪放牧于河下游地方，不仅接近卡伦，而且地方狭小。先前，因索伦、达斡尔牧放孳生马匹倒毙甚多，陆续通融办理补充，其生计仍为贫困。唯孳生牛只有利于其生计，去岁经将军具奏请旨，又添给孳生乳牛五百只。自此项孳生牛只交伊等牧放以来，孳生颇佳，乳汁增多，与其生计尚有裨益。索伦等原牧放孳生马一千匹，陆续孳生马驹二百九十六匹，亦添给牧放孳生，又牧放私有牲畜，地方狭小，草场不佳，且去冬雪大，气候寒冷，牲畜倒毙甚众。本年应交孳生儿骡马驹数目不足，经各自尽力办理照数交纳。此项孳生马匹，若仍留给伊等牧放孳生，庶乎与其生计及官牧厂孳生均无益处。”^③于是，伊犁将军舒赫德将索伦营牧放的 1296 匹孳生马分别移交给察哈尔和厄鲁特营牧放。后因索伦营官差逐渐增多，加之开垦种田和牧放私蓄，再无暇尽心牧放仅剩下的 1300 余只孳生牛。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 年），“将军保宁奏准，将索伦营牧放孳生牛只全行撤出，分交察哈尔、厄鲁特牧放取孳。”^④

①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181—054。

②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272—011。

③ 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 2519—009。

④ 《钦定新疆识略》卷 10，第 3 页。

总之，索伦和达斡尔官兵从黑龙江千里迢迢携眷移驻新疆伊犁，在近一个半世纪内，经历千辛万苦，坐卡巡边，驻守城池，开垦种田，牧放官畜，为保卫和建设我国西北边疆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。